

元好问生平解读(下)

□薄振宇

骨。元格尤重实践教育,常带元好问参与地方政务,“观断狱,察农桑”,使他早早便洞悉儒家“致君尧舜”之理与民间疾苦的现实关联,为其日后践行“仁政”埋下伏笔。

恩师郝天挺深刻塑造了元好问的人格与学术底色。郝天挺“通经史,精百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引导元好问步入学术殿堂,其《与元裕之论诗书》中“诗以载道”的主张,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得到系统阐发。他教导元好问“为学当有独立之见,不盲从古人”,见其早年刻意模仿李白诗作便直言劝诫,此番教诲不仅催生了元好问“眼处心生句自神”的核心创作观,更涵养了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气节。

文坛领袖赵秉文是元好问的“伯乐”。青年时期元好问的一首《箕山》,使赵秉文惊叹“少陵以来无此作”,随即在北方文坛大力举荐,使他迅速跻身名家之列。更可贵的是赵秉文“甘当人梯”的胸襟,在《赠元遗山》中写道“文坛谁是主?吾子可登坛”,这种气度为元好问后来传承文脉树立了榜样。

赵天锡在乱世中为元好问提供了关键庇护。金亡之后,元好问颠沛流离,赵天锡“馆其家,供笔墨,助其编书”,以坚实的物质支持保障了《中州集》编纂工作的持续推进。元好问在《赵天锡墓表》中深情感念:“天锡于我,非独知遇之恩,实再造之德也。”

未曾谋面的孙九鼎,为元好问奠定了文脉传承的精神根基。孙九鼎出身定襄儒学世家,金天会年间应试经义科状元。元好问少年时精读其文,并坦言“过目始知为文当有骨”,可见其对元好问文风的深刻影响。孙九鼎活跃于金朝从“武治”向“文治”转型的关键期,而元好问生活于金朝由衰而亡的末期,但两人却共同完成了金代文化“从开创到总结”的闭环。元好问在《中州集》中为孙九鼎立传的篇幅远超同期文人,并明确将其列为忻州文派的源头。

五位贵人对元好问的提携表明,文化传承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奋斗,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这种“传帮带”的文化传统,使中华文脉如江河奔涌,虽遇险阻却依旧绵延不绝。

“7”:科举坎坷中的文学蜕变与精神升华

从初涉科场到终止应试,元好问历经近二十载光阴、七次考场角逐,屡败屡战。这段看似失意的坎坷历程,实则是淬炼其文学风格、升华其精神境界的“炼丹炉”,生动印证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文学至理。

科举的屡次失利,让元好问跳出仕途

功利的桎梏,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与精神世界。早年他一心追逐“致君尧舜”的功名理想,诗作虽有才情却难脱窠臼;多次落第后,他远离官场中心,遍历民间疾苦,亲历山河破碎的乱世图景,笔下文字渐褪浮华,平添沉郁苍凉的质感与悲天悯人的情怀。那些辗转流离的际遇、目睹苦难的触动,皆化为创作的源头活水,让其诗作兼具现实厚度与情感张力,最终成就“丧乱诗”的千古绝唱。

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失意促使元好问的思想从单一追求功名升华为对命运的深层思考。他在《饮酒五首》中写下“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流露出对世俗功利的超脱,彰显了对文化本真的坚守。这种认知让他能够以宏观视角审视金元鼎革的时代变局;既悲叹金朝覆亡,又洞察“天下一家”的历史大势;既坚守儒家气节,又包容蒙古政权中的汉化力量。这种执两用中的处世智慧,让他在乱世中得以坚守文人风骨,以务实之举扛起文脉传承的使命。

七次科举的磨砺,恰如凤凰涅槃的烈火,烧掉的是元好问对功名的执念,留下的是其对文学的一片赤诚。当仕途之门关闭,他反而走进了更辽阔的精神天地,提出“士不遇时,当自养其浩然之气”的人生信条。这场精神升华,让元好问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能摆脱功利束缚,臻于淡泊澄明之境。

结论

通过对“1223357”这组数字密码的解读,我们得以全景式窥见元好问波澜壮阔的一生。作为“一代文宗”,他以“重实感、贵真情”的创作实绩树立文学标杆,以系统的诗学理论引领北方文坛潮流;两年囚禁的磨难淬炼其史笔担当,两部史著为当世文化留存珍贵火种;三任县令的治政实践诠释儒家仁政理念,作为“龙山三老”之一的讲学经历延续文脉薪火;五位贵人的支持为其构建起立体的成长网络;七次科举的坎坷促成其精神境界的升华。这些人生片段相互交织,不仅塑造了元好问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文学风格,更映照出金元之际社会的动荡变迁与文化的坚韧传承。

元好问的人生实践,揭示了金元之际北方文化“在断裂中延续、在变革中新生”的内在脉络。他以创作立标杆,以理论定方向、以文献存根基,以教育续薪火,用一生践行初心,印证了传统文化在乱世中仍具强大的生命力与顽强韧性。其“重实贵真”的创作理念、“直笔修史”的治学精神、“知行合一”的儒者品格,不仅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更为当代文化传承注入了深厚精神力量,深刻彰显了中国文脉“劫火不灭、薪火相传”的永恒魅力。

书香一品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不少人引用苏东坡这首诗来为一次旅行总结,其中有未到时的执念,也有到过的释然。王必胜散文集《在乎山水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写的也是在山水间行走的滋味,却没有如此这般的执念与释然,因他笔下多数都不是“此生必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他写的是一种怀着平常心的遇见。

红水河畔的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隐掩在大山坳里的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大兴安岭林区的内蒙古牙克石市塔子气镇,长江中的岛屿城市江苏扬中……这些地方可能名不见经传,却让作者一见倾心,并为之花费笔墨,用他的话说——“美丽是没有来由的,魅力是无所谓大小的”“那些藏在深闺、原汁原味的生态,鲜为人知的人文故事,更能激发文思,勾起写作冲动”。

短视频时代,“远方”被揭开神秘面纱,大城小县的能见度都在显著提升。手机一搜索,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尽收眼底,为什么还要一字一句地来读游记文学呢?

《在乎山水间》以五十余篇长短不一的记述,让我们看到“跟着文字去游览”的妙处。《清流啊清流》《婺源看村》《徐霞客的上林》《在安溪喝茶想到苏东坡》,翻看这些篇章,不由得会被作者的“饶有趣味”而感染,他自己陶醉其间,才能一一道出其中的好。这“道来”背后需要一步步用脚丈量,亲身体会,对每一地都细致端详,后又加以研究,于诗、史、书中寻证,探究个中深意。书中一些寂寂无闻的地方写得别有洞天,正体现了一个理想“访客”不厌其烦的开拓行为。

说“访客”,是和当地的人文旅介或生于斯、长于斯的自家之言相比,后者如数家珍,自豪感满满,却少了可让读者代人的同理心;访客则不一样,他会直接表示对此地知之甚少,愿意和读者一道以陌生眼光去一点点打量。同样是游览婺源,美景以外,作者印象深刻于当地文脉,“山间茅屋书声,放下扁担考一场”,是读书传家的文化传统让婺源的至美有了更实在的依托。同样是欣赏楠木,在其纹理丰富、色泽高贵、暗香袭人之外,作者尤其震撼于根系外露而生出的状如葫芦或袖子的结瘤,名贵如斯的树种却如此负重隐忍,实在令人心生对自然的敬畏。

《在乎山水间》是山水游记,更是生态散文。作者在序言里介绍,当下不少人把游记当配角,认为描写山水的文字多为游山玩水之作,不登大雅之堂,这与一些创作弊端不无关系。眼下,生态文明得到空前重视,游记文学特别是书写自然山水的生态散文渐为兴起,理应有新的表达、新的气象,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作者正是怀着这样的初衷一次次出发,在抵达之后通过文学书写第二次抵达,描绘他所看到的风光,在有限篇幅内斟酌锤炼,展现文学的眼光、趣味和诗意。作者对水情有独钟,这些散文篇章如流水一样,亲切、自如,曼妙、生动,既洗人耳目,又净化心灵。本书借欧阳修名句“在乎山水之间也”为题,在乎山水间,在乎的正是这样一种被自然所淘洗的境界吧。

书写是第二次抵达

——读散文集《在乎山水间》

□顾妍



“33”:治政实践与教育传承的双重担当

元好问生平中的两个“3”,勾勒出他作为儒家士大夫的实践品格与人生追求:三任县令的治政经历,践行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晚年以“龙山三老”之一的身份投身讲学,诠释了“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坚守。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他“经世致用”的完整人生图谱。

元好问历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在乱世中践行儒家“仁政”理念,将理想转化为务实举措,为百姓撑起一片安稳天地。在镇平县任上,他主张推行“户等制”,通过“验土地肥瘠,定赋税等差”的精细化管理,缓解赋税不均的弊端与社会矛盾。针对兵乱后荒田遍野、流民失所的状况,他提出“计口授田”,规定“流民复业者免租三年”,帮助百姓重返家园、重拾生计。在内乡任上,元好问目睹“赋税苛重,民多逃亡”的凄惨景象,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税,使当地民生得以改善。同时,他还将“农桑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主持修建灌溉设施,破解当地灌溉难题。在南阳县任上,元好问通过整顿市场秩序、规范交易规则,有效打击了囤积居奇乱象,维护了市场公平。此外主持修建引水灌溉工程,彻底解决了城西耕地的旱涝问题,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这些治政实践虽未触及高层,却诠释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晚年的元好问归隐封龙书院,投身讲学,与数学家李冶、理学家张德辉并称“龙山三老”。彼时他主讲“经义”“治事”“文艺”三科,开创“学术+实践”模式,打破了传统书院“重章句、轻实务”的局限。据《元朝名臣事略》记载,他常教导学生“不泥章

句,重实务”,带领弟子考察农田水利,探讨“如何复井田之制于乱世”;每讲解《论语》“为政以德”时,必以自己任县令的亲身经历为例,阐明“德政不在空谈,而在富民”的道理。这种务实的教学理念培育出郝经、许衡等一批杰出人才;郝经后来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要谋士,提出“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主张,积极推动蒙古政权汉化;许衡则主持元代国子学,将程朱理学纳入官学体系,成为“朱子学北传”的关键人物,为儒学在元代的复兴与发展奠定基础。

从地方治理的实践者,到教育传承的播种者,元好问完成了人生角色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的内核,始终是儒家“以道济天下”的不变追求。而两个“3”的精神联结,共同指向“文化落地”的实践哲学:治政守护民生,讲学传承文脉。元好问用一生证明,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坐而言”构建思想理论体系,更要“起而行”将理论转化为守护文明、造福百姓的实际行动。

“5”:贵人相助的成长网络与文化生态

元好问的成长轨迹与文化成就,并非孤立的个人奋斗,五位关键人物如星辰般照亮了他的人生道路。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的“贵人”,不仅在具体事务上对他给予支持,更在精神层面塑造了其文化品格,印证了文脉传承的群体性与延续性。

叔父元格是元好问的启蒙引路人。据史籍记载,元好问年少丧父,由元格抚养长大,叔父常教诲他“学者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元格历任陵城、陵川等地县令期间,元好问始终随行左右,这种“行走的教育”不仅培养了他对山河大地的深厚情感,更将北方地域的雄浑之气注入其诗作风

唐人爱马的生动呈现

□呼啸



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局部

的箭囊,马匹身上配备“六鞮”,这些皆指向其军事用途。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虽以娱乐为表,实则可视作军事训练的延伸。唐代府兵制下,军人需自备马匹与器械,马匹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战斗力。唐太宗李世民钟爱的“六骏”,便是其南征北战、奠定基业的见证。王维在《观猎》中写道:“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狩猎与征战,在唐人精神中常相通互喻,那马蹄踏雪的轻捷,何尝不是战场上摧枯拉朽的隐喻?李贺更是以马喻志,在《马诗》中高歌:“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铃声。”这铮铮铁骨,正是大唐军魂与进取精神的化身。

击鞠戏春,代表了唐人娱乐竞技的激情与风雅。唐代马球运动风靡朝野,章怀



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局部

太子墓《马球图》生动再现了这一幕:骑手或反身击球,或扬杆欲挥,马匹四蹄腾空,背景青山古树点明这场户外竞技的欢快氛围。唐代史料中记录,唐玄宗李隆基曾率大唐马球队力克吐蕃马球队,其“东西驱突,风回电激”的英姿流传千古。韩愈在《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中极尽描绘:“球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绶黄金鞮。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马球场上,人马合一,激烈角逐,既是力量的比拼,也是技

巧与智慧的较量。此外,狩猎、骑射乃至宫廷仕女的“驴鞠”,都是唐人的娱乐活动,展现了唐代社会充沛的生命力与开放包容的生活情趣。

纵观这些壁画与诗篇,马在唐代已远非普通畜力,而是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它代表着速度与力量,象征着忠诚与勇毅,寄托着抱负与豪情。唐人爱马、懂马、驭马,将自身的开拓气概、进取意识投射于这亲密的伙伴身上。从“昭陵六骏”的凛然雄姿,到敦煌壁画中的壮观仪仗,再到无数唐诗中吟咏的骏马意象,一种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始终。马背上的唐人,拓展了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文明,缔造了空前繁荣,这种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我们面对挑战时“骏马似风飙”的果敢,在征程中“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自觉。

当我们在博物馆中凝视这些千年前的壁画,那马匹矫健的线条、骑士飞扬的神采,依然能穿越时空,激荡人心。马的故事,是唐人的故事,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奋进、生生不息的故事。它提醒着我们,在那段奔腾的岁月里,有一种精神,如神骏追风,永不止息。

画说



弓淑英 作

探源溯源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珍品展”的展厅内,数幅出自唐代的墓葬壁画,静静诉说千年前一个马背上的时代。初唐淮安王李寿墓墓道东壁的《备马出行图》中,42匹青、灰、白、红、褐各色交织的骏马昂首阔步,马上骑士手持红旗,相互顾盼,一派王公贵族仗仗出行的煊赫气象;盛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西壁的《马球图》,20余骑驰骋如风,青山古树为幕,马蹄翻飞间尽显“神骏追风”的活力……这些定格在墙壁上的身影,不仅是唐代绘画艺术的瑰宝,更是一扇窥见唐人生活脉搏的窗口。

鞍马风流,尽显日常出行的威仪与便捷。李寿墓东壁一整幅《备马出行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中部一匹形体高大的白马,鞍鞴齐全,马镫垂落,胡人控马者站立一旁,6名侍从分别持伞、执扇、携弓,严谨的仪仗规制透露出初唐贵族出行前的庄重准备。杜甫在《丽人行》中描绘杨氏姐妹春游:“背何何所?珠玉腰极稳称身。”鞍马的光彩与丽人的华服相映成趣,勾勒出唐代上层社会出行时人马一体、风流倜傥的画卷。即使在边塞,马也承载着寻常人的生计与思念,正如岑参所写:“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铁骑踏阵,是军事征伐的倚仗与雄魂。墓葬壁画中,骑士身侧挎着插满箭簇